

郭忠华 编著

CITIZENSHIP IN THE CHANGING SOCIETIES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

全球化视野下的“公民”对话
东西方社会学家有关世界未来的对谈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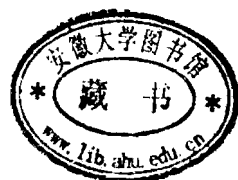


CITIZENSHIP
IN THE CHANGING SOCIETIES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

郭忠华 编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
郭忠华编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218 - 07243 - 2

I. ①变… II. ①郭… III. ①思想家—访问记—
世界 ②公民—身份—研究 IV. ①K815.1 ②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0068 号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

郭忠华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肖风华 梁 茵

封面设计：△ 介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穗彩印厂

书 号：ISBN 978 - 7 - 218 - 07243 - 2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数：250 千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9667808

序 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本人先后关注过两个迥然不同的主题：一是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二是西方公民身份理论。这两个表面上看似差异迥然的主题，对我却产生着内在连贯的影响。首先，吉登斯本人对于 T. H. 马歇尔和当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大量论述，使我对公民身份形成某种程度的理解；其次，吉登斯所建构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则为我思考公民身份提供了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过去十多年来，本人正是在这两个主题的双重推动下一步步迈入学术的殿堂。同时，不论对哪个主题的研究，本人又都始终遵循“进入现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表现在“读其著作、听其言说、与其交流”等研究环节上，目的在于掌握第一手研究材料。“读其著作”就是研读吉登斯或者公民身份领域相关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听其言说”则是近距离接触这些思想家，解答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获得无法通过其著作而了解到的背景知识或者其他观点；“与其交流”则是与这些思想家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时时掌握其思想动态。“读其著作”为“听其言说”打下良好的基础，使言说有其基础和目标；同时，“听其言说”反过来又促进对相关著作的阅读，使阅读的理解更加深刻；最后，“与其交流”则是使言说和阅读能够持续下去的保障和补充。

本书正是上述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观照下的产物。从主题的角度来看，全书集中于两大主题：一是“现代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对

吉登斯的五次访谈上；二是“公民身份的政治想象”，主要体现在对恩靳·艾辛（Engin Isin）、约翰·基恩（John Keane）、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kski）等人的访谈上。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书不是一本标准的专著，而是一本访谈录，在语言风格上也体现出许多口语化的特征。

在时间跨度上，对吉登斯的五次访谈跨越了从2007年到2009年三年的时间。2007年12月，在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梁庆寅副校长和政务学院任剑涛、马骏、肖滨、郭志坚等诸位领导的支持下，本人组织召开了“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吉登斯携夫人参加了会议。通过此次研讨会，不仅增加了我对于他的了解，而且还为此后的“听其言说”和“与其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9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从事学术访问期间，我先后围绕“人类创造历史”、“结构化理论的知识基础”、“民族国家的当代状况”、“气候变化与政治革新”等主题，对吉登斯进行过四次专访。这些专访与2007年末的“经典思想家与现代性理论”结合在一起，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吉登斯本人的学术发展历程，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兴起和解释以及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状况。

有关公民身份主题的访谈则集中在2009—2010年两年。2009年，在谢菲尔德大学访问期间，我不仅对吉登斯进行过多次专访，而且还对恩靳·艾辛、莫里斯·罗奇（Maurice Roche）、露丝·李斯特（Ruth Lister）、柯林·海伊（Colin Hay）等著名学者进行过访谈。恩靳·艾辛是当代西方公民身份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不仅与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共同创办了《公民身份研究杂志》（*Journal of Citizenship Studies*）、《公民身份研究手册》等重要刊物或著作，而且还在公民身份理论、移民的公民身份、东方社会的公民身份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收录的《公民身份的当代概览》，反映了公民身份的含义变化、公民身份行动以及东方主义之后的公民身份等内容。莫里斯·罗奇为英国著名学者，在社会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等领域具有独到的研究，其所著的《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等著作在公

民身份领域有着持久的影响。本书收录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再思考》，聚焦于社会权利主题，全面展示社会权利的兴起背景、主要表现、当代困境和发展走向。露丝·李斯特不仅是著名的新社会运动领导人物，而且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所著的《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的视角》反映了女性主义者对于传统公民身份的批判和新公民身份范式的设想。收录于本书的《女性公民身份的再思考》，体现了她对于这两个主题的思考。柯林·海伊为英国新生代著名左派理论家，在国家理论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收录于本书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公民身份》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公民身份在其中的地位。

2010年，同样是在政务学院诸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组织召开了“公民身份、公民社会：世界主义的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约翰·基恩、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托马斯·雅诺斯基、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等十余名国际知名学者齐集中山大学，共同探讨世界主义背景下公民身份的发展趋势。会议期间，笔者有幸对德兰迪、基恩、雅诺斯基等人进行了专访。德兰迪为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主义主题的研究，对他的专访反映了世界主义背景下公民身份的发展走势。基恩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民主政治的研究，近年来热衷于“监督式民主”专题，对他的专访反映了他对于监督式民主的看法以及监督式民主视角下公民身份的含义。雅诺斯基为美国肯塔基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从事劳工权利、移民权利等主题的研究，他所著的《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在公民身份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收录的《劳工、移民与公民身份的理论化》，反映了他从劳工、移民的角度对于公民身份的看法。同时，考虑到主题的一致性和视角的互补性，本书还将郭台辉博士对意大利著名学者瑞纳·鲍伯克（Rainer Baubock）的专访纳入其中，它可以使读者对当代全球移民浪潮下移民的公民身份问题形成较全面的理解。上述四个专访与2009年本人所进行的四个专访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幅斑驳的公民身份图景。

我感谢上述学者接受本人的专访。古语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和交谈，不仅大大加深了我对于吉登斯思想和公民身份的理解，而且还使我领略了他们丰富的人格魅力。感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马骏、肖滨、谭安奎、黄冬娅等诸位朋友，他们为我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学术环境。如果说每一次访谈都是一顿令人愉悦的精神大餐的话，那么，访谈整理的过程却是一种使人倍感折磨的过程。我谨向何惠莹、王永香等同学表示诚挚的谢意，她们为部分访谈的整理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最后，我还深深感谢我的家人。为了我的事业和追求，妻子鹏艳承担了几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并在我感到迷惘的时刻给予我鼓励、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予我希望。

郭忠华

2011年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现代社会变迁

对“人类创造历史”的再认识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一 / 003

结构化理论的知识基础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二 / 015

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三 / 031

气候变化与政治革新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四 / 044

经典思想家与现代社会理论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五 / 066

公民身份的政治想象

公民身份的当代概览

——与恩靳·艾辛的对话 / 077

劳工、移民与公民身份的理论化

——与托马斯·雅诺斯基的对话 / 106

社会公民身份的再思考

——与莫里斯·罗奇的对话 / 129

女性公民身份的再思考

——与露丝·李斯特的对话 / 162

全球移民浪潮下的公民身份

——郭台辉与瑞纳·鲍伯克的对话 / 185

监督式民主与公民身份

——与约翰·基恩的对话 / 197

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公民身份

——与柯林·海伊的对话 / 220

世界主义背景下的公民身份

——与杰拉德·德兰迪的对话 / 243

现代社会变迁

/ 对“人类创造历史”的再认识 / 结构化理论的知识基础

/ 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 气候变化与政治革新

/ 经典思想家与现代社会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1938年1月1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Edmonton）。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心理学专业，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进入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66年至1968年间，前往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短期教职。1969年受聘于剑桥大学，任国王学院讲师兼院士，同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7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85年，被聘为剑桥大学首位社会学教授，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会长。1997—2003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第11任院长。2004年，从伦敦经济学院退休之后被授予勋爵（lord）头衔，并出任英国上议院议员。吉登斯同时还是著名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办者。1997年，曾随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访问中国，并到中国社科院作“第三条道路”演讲。2007年，访问中山大学，出席“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并作“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演讲。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吉登斯一直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到2009年止，共计出版各种学术著作46部，其中专著26部，另外还发表论文200余篇，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

对“人类创造历史”的再认识

——与吉登斯的对话之一



在1981年至1994年这一段时间里，吉登斯先后出版了“社会理论三部曲”，建立起完备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第一部曲的中文版行将在中国面世之际，2009年9月7日，应吉登斯的邀请，郭忠华对他进行了专访。本次访谈的主题主要围绕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创造历史”格言展开，较全面地体现了吉登斯的历史观，以及他与马克思之间的知识关联和他三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变化。（上图为郭忠华与安东尼·吉登斯/摄于2007年12月1日）

马

克思仍然有着许多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挣扎于马克思所揭示的某些问题之中，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一、马克思的真知灼见

郭忠华：很高兴您拨冗接受我的专访。我们今天的访谈可能与您近来接受的许多访谈不同，因为我们是要回到以前，回到您学术生涯的早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您早期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比如您对三大思想家著作的诠释、结构化理论，以及您所建构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前不久刚翻译完您“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三部曲的完整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二十年，第一部曲的出版到现在则已过去了近三十年，请问您当初设计这“三部曲”的初衷是什么？

吉登斯：说实话，有些东西现在连我自己都记得不是太清楚了，真是对不起。但我想总体来说是旨在做三件事情。首先是社会转型理论（transformation theory）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来阐述这一理论。在那一时期，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历史取向（orientation）。我试图把他对于历史的解释置于现代社会兴起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这种背景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理论的源泉。这是我的第一个关注点。同时，我也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将社会学研究与古典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一关注点后来促使我写成了

《社会的构成》一书。第三个关注点则是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给全球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对于这些研究主题，你可以设计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案，但你也可以把它们分成三卷来写作。第一卷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思考社会历史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探讨过去形成的各种文明，以此了解人类究竟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第二卷则是对民族国家和工业社会进行社会学思考。民族国家的权力是现代性发展的关键方面。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与工业社会以前的传统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第三卷的主题要写什么，我曾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第三卷原来计划探讨有关国家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当历史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传统政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发生了改变，现代国家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已经枯竭，国家认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我后来改变了原来的写作计划，没有针对这一具体问题，而是从不同的视角构思了第三卷的写作主题，它与前面两卷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

郭忠华：1998年，您在接受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的采访时，他问起您贯穿一生的学术研究主题，我记得您是这样说的：“我想要考察以往经典社会理论的发展，为社会学建立一个新的方法论框架，以分析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如果这样说的话，这意味着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成为您学术研究的主题，您前面的工作都在为研究现代性进行铺垫。但如果按照您刚才所说，里面尽管也提到了现代性，但只是把它置于您的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似乎并没有如接受那次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把现代性作为您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

吉登斯：皮尔森的那次访谈是我第一次接受如此系统的采访，我的意思是它的可信度比我现在在这里所讲的要更高。

郭忠华：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大经典思想家当中，您似乎对马克思投入了最多的研究精力。请问在这三大经典思想家当中，何者对您影响最甚，尤其是您如何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之间的知识联系。

吉登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想传统，尽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有很多人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正因为这种原因，我始终对马克思·韦伯的学说感到某种亲和力（affinity），尽可能以某种不同于马克思的笔法进行写作。在我看来，与那个时期相比，即使在当今，马克思学说的真知灼见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那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和后果所进行的卓越分析。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问题之间不无关联。资本主义不能有效地维持自身的运作，马克思已经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学说中比较成问题的倒是那些被看做是其最重要贡献的部分，即有关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理论。俄罗斯（应当是前苏联）曾经标榜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不认为它真正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多少东西。因此，马克思仍然有着许多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挣扎于马克思所揭示的某些问题之中，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尽管他在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郭忠华：我也相信今天振荡全球的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分割的联系，您是否可以就这一问题提供某些更详细的解释。

吉登斯：当然，马克思本身对金融资本主义就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的分析对于分析当今金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来说仍然有效。但是，超越于马克思当时的视野，具体到发生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上来，我想马克思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肆无忌惮的全球金融市场，如何才能控制它所带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因此，我们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给他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挥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就拿我们上次谈论（指2009年4月22日笔者对他进行的一次关于“气候变化与政治革新”议题的专访）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来说，市场在其中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面对这一问题，你可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因此它不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马克思的

理论可以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大量的见解。

郭忠华：马克思试图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气候变化当然与资本主义存在某种关联，但我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其历史上不是没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一个有关自然的问题如果与阶级或者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会使我们得出某些不可思议的结论。实际上，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的核心关注主题，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其超越问题，他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的问题性。

吉登斯：但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必须具有某种前瞻性思维。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必须把各种由社会机构所推进的议程转而由政府来接管，使之能够以一种系统而连贯的方式加以协调，这些做法与马克思的思想不会没有关联。

二、“人类创造历史”的精义

郭忠华：我在翻译和阅读您的著作的时候，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提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著名论断：一是“人类创造历史，但却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二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即使是你最近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您都还是提到了后一个论断。

吉登斯：啊，对的，没有错，我的确大量引用过这两句话。这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气候变化可以证明这一哲学所隐含的潜在局限，要把这一格言的理想变成现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哈哈……

郭忠华：那么，在您看来，对于理解马克思本身的思想 and 理解我们当今问题重重的现代性来说，马克思的这两句格言是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吉登斯：“人类创造历史，但却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以一种非常精练的方式揭示了人类行动的方式。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这句格言非常正确地强调了行动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行动的意外后果对于历史变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人类历史的难以控制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确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却并不是按照人类设计好的方案发展前行。以当代社会为例，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句格言是解读人类与历史关系的非常好的视角，其中包含了各种根本性的议题。人类历史上充斥着各种革命，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存在非常明确的目标，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其结果却非常难以预测。历史也一样，要想对它加以控制（manage）是非常困难的。以因特网为例，没有谁预料到它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样，谁也没有预料到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谁也没有预料到1989—1991年的世界大变革。人类行动总是不可避免地两种因素相形随：意料之外的后果和没有预料到的后果（unforeseen consequences）。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因素，前者表明了人类行动的特征，后者则表明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郭忠华：我多次阅读过您的《社会的构成》，我对您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尤其印象深刻。您在该书写道：“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思。他说道：‘人类创造历史，但却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没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的。但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有什么毛病的见解应用到社会理论中去时，引发的问题却是多么的多啊！”长期以来，吉登斯研究者们只是把结构化理论看作是一种针对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所建构起来的理论，很少把它与马克思关联在一起。但如果联系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主题以及您在各著作中对这一格言的广泛引用，那么，这的确使我认为，您同时还在向读者表明，结构化理论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潜在的目标，那就是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解释，即表明“人类到底是如何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吉登斯：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表明的人类与历史的关系，其中其实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没有文字、没有其他记号的文明中，他们